

闲话

主编 / 臧杰

青岛出版社



同
路
殊
途

杨度：市井有谁知国士

晚清「支那暗杀团」人物寻踪

光绪：权力博弈中的罪与罚

同路殊途：胡适与邵飘萍

施蛰存与民国报刊

钱穆：拾级而上的「草根」

曹禺《北京人》的男权美梦

1930年：一座后殖民地城市里的文人生活



闲话

臧杰·主编 青岛出版社

闲话文丛



特辑



同
路
殊
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闲话(15)同路殊途 臧杰主编.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436-7842-2

I. ①闲… II. ①臧…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5794号

- | | |
|------|--|
| 书 名 | 闲话(十五)同路殊途 |
| 主 编 | 臧 杰 |
| 出版发行 | 青岛出版社 |
| 社 址 |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
| 本社网址 | http:// www.qdpub.com |
| 经 销 | 北京时代联合图书有限公司 010-65513628 65512133 |
| 责任编辑 | 金 龙 |
| 特约编辑 | 贺中原 单蓓蓓 |
| 封面设计 | 乔 峰 |
| 平面制作 | 墨点平面设计工作室 |
| 制 版 | 青岛人印人数码输出有限公司 |
| 印 刷 |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
| 出版日期 |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
| 开 本 | 24开(889mm×1194mm) |
| 印 张 | 16.75 |
| 字 数 | 320千 |
| 书 号 | ISBN 978-7-5436-7842-2 |
| 定 价 | 39.80 元 |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 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 68068629

闲话

目录

同路殊途○

杨度：市井有谁知国士 / 李 洁.....	1
晚清“支那暗杀团”人物寻踪 / 张功臣.....	58
光绪：权力博弈中的罪与罚 / 傅 野.....	127
同路殊途：胡适与邵飘萍 / 散 木.....	167
施蛰存与民国报刊 / 刘 军.....	216
钱穆：拾级而上的“草根” / 张昌华.....	250
曹禺《北京人》的男权美梦 / 张耀杰.....	274
1930年，一座后殖民地城市里的文人生活 / 李 明.....	316



杨度：市井有谁知国士

李 洁

一

杨度，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奇人，一个谁当政也不能小觑的清客。回眸北洋时代，视线躲不开杨度。

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1875年1月10日），杨度生于湖南湘潭，和十八年后出生的毛泽东同籍，本名杨承瓚，字哲子。这位少时即得清名的三湘才子，这位执政者的座上宾，这位黑白两道都能摆得平的“老大”，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他忽现忽隐的身影曾牵动了多少国人的视线。得意时他出入京华豪门，失意时他避居天津、青岛，按说，无论湖南还是北京，也无论津门还是岛城，都总该留有一两所杨氏遗址才是。可是，翻遍这些城市的相关图书，已经找不到一处杨度的故宅了。

也许真的没有了。当年，为了搭救在北大任教的“过激党”朋友李大钊，杨度把京城的住宅“悦庐”卖了；数年后，为了救济李大钊同案烈士们的遗属，他又把远在青岛的前德国租界里的洋楼卖了。失了私



宅的杨度只能做权势者的门客，从京城，到沪上，直至死。所以，我虽生长于青岛，对清末民初寓居岛城的名人的宅第不太陌生，但从来不知道哪座洋房曾属于杨度。而且，我曾两度在天津探访旧时租界里的名人故居，也没有谁告诉过我杨度曾在哪栋小楼里落脚。

○ 杨度

北京西城区的丰盛胡同曾有杨度居住的“悦庐”。数年前，我曾自西向东走过两遍此胡同，几百米长的胡同里已经没有一座像样的旧时豪宅，而且，新拓宽的太平桥大街刚刚又切去了胡同的西端。一位出门倒垃圾的中年居民说，他家长辈就住这条胡同，不知道杨度是干什么的；至于老宅子嘛，没了，一个也没了，本来胡同西头儿的北边，还有几栋从前的大宅子，但现在都拆了。

回看“胡同西头儿北边”，正是一地残砖废瓦。我知道，一座新建筑很快就会崛起，与太平桥大街西侧的那幢近年新建的全国政协办公大楼隔路相峙。

丰盛胡同里，有几家中央级单位，而这几个单位，又与曾经住在这里的这位奇人都有着某种关联。胡同东头有国家档案局，北边有中国法学会，南边有中央编译局。杨度乃清代最有名的宪政鼓吹者，他创办的第一本刊物，叫《游学译编》，是翻译介绍各国政治体制的最早的期刊；他出任的第一个公职，是清廷“宪政编查馆”的“行走”，主管的就是对西方各国宪政状况的翻译及对中国宪政路线的设计。当年，这位新锐的法学家，不仅是《钦定宪法大纲》的诠释者，还是《大清新刑律》的起草人之一。而且，他还是末代王朝的内阁统计局局长，那时的统计局，兼有后世的档案局职能。你看，他的主要人生履历，都与丰盛胡同的三个“国”字号单位有关。可是，丰盛胡同，乃

杨度：市井 ○
有谁知国士

至整个京城，却没有给他保存一席之地。

所以，在北方，我也就一直没能与这位奇人“碰面”。

倒是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我却两度与之“邂逅”。

虽说是上个世纪、上个朝代的事了，但“杨度”两个字依然是个幽幽散着神秘微光的人物，以致两度遭遇都颇令我踟蹰，不知自己该不该摸着这微光一直走进二十世纪之初。我很怕自己迷失在那段烟雾弥漫的历史里。

两次相遇的日子，都十分难忘：

一次是在1995年6月1日，那天因与孩子有关而使我耿耿于心，而我也真的是在一位大孩子的指引下走进了著名的万国公墓——那天，我本是去谒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的，无意间却走到了“杨度之墓”的碑石前。

还一次是2000年1月8日，那天是周恩来先生的祭日，我恰巧在上海半晌无事，便请《新民晚报》记者高晨女士领我去看前朝的“周公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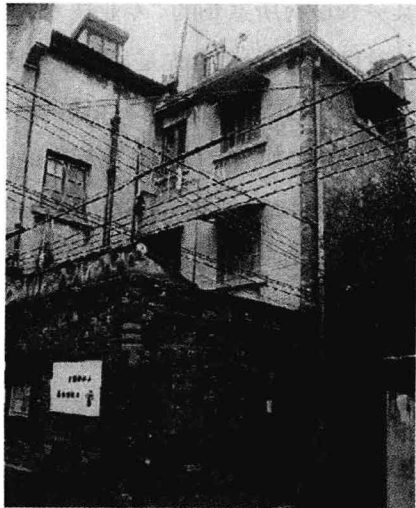
从幽静的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回来的路上，在一个公交车的站牌旁，偶然看见一方里弄口的墙上嵌着一块小小的铭牌，上面刻着四个字：杨度故居。

我不禁为这巧合暗自一惊，因为周公确乎与杨某有着某种神秘的关系！

乱纷纷的闹市中，我一下子想起杨度的一句哀己不幸的诗来：

市井有谁知国士？

○ 杨度故居



是哟！现在，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这位北洋时代的“国士”呢？

二

国士，顾名思义，国家级士人。士，乃古时候对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的一个阶层的称谓，士往往是读书人。辞书上的“国士”解释是：古时指国中才能或勇力出众的人，举例为司马迁说到淮阴侯时，即发过如许感慨：“诸将易得耳，至如信（韩信）者，国士无双。”瞧，只有韩信那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国士”，而且，这样的人是“无双”的。可见，国士难求矣！

国士不是天生龙种的国君，更不是凡夫俗子，也不是随便在某行当里留下点名声的人。曾见过一套近年出版的《百年国士》丛书，章太炎、梁启超、辜鸿铭、蔡元培、鲁迅、齐如山、苏曼殊、吴宓、叶圣陶、钱穆、冯友兰、老舍、张大千、冰心、沈从文、巴金、季羡林等人都在身卷中，把真国士如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这几位，与众多的文艺名流混为一谈，这实在是编著者对“国士”的误解与滥用。

我理解的国士，当是一国之中通天接地的栋梁之材，而不是只在某一领域有所造诣的“专业技术人才”；国士乃见解超前、韬略过人的时代的先驱，他首先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学家或别的什么家。国士的“证书”是靠当代舆论和历史两位“评委”共同颁发的，而不是由当朝的官场位置或后世的政治需要决定的；此“证”不能滥发，不能如现今这般高级技术职称的帽子满天飞。而且，国士也决非割一茬又生一茬的韭菜，国士往往不可再生。国士是只在国运式微或君主求助时应运而生的特殊人物，平和的历史时期和过于刚愎强悍的君主都不需要国士。总之，国士是中国历史森林中的巨大乔木，各时期的风景线因了他们的存在才显得生动和多彩起来。

杨度自称为国士，倒也不是他太不虚心使自己进步，因为早在清

杨度：市井○
有谁知国士

朝末年，名满天下的梁启超背地里就这样赞誉他了——梁氏在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推荐杨度“才似谭嗣同，当以国士待之。”喏，连才高气傲的梁先生都这样认为，可见，杨度的“国士”头衔早已为国人所公认。

杨度确也不凡。他在那首名噪一时的《湖南少年歌》中，有几段说的是自家的身世：

我家数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儒。

家人仗剑东西去，或死或生无一居。

我年十八游京甸，上书请与倭奴战。

归来师事王先生，学剑学书相杂半。

清代以前的“少年”，指的不是今天的脖子上绕着红领巾的小学生，而是现今的“青年”，古代经典里的“少年”，说的都是青年男子，如辛弃疾的“少年不识愁滋味”和岳武穆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无不如是。民国初期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和赵世炎、陈延年、周恩来等人在巴黎郊外成立的“少年共产党”，也都是指青年而非幼童——对了，清朝那会儿，“幼童”大约与现在的“少年”相对应。杨度写这首长诗时，二十八岁，还算是当时语境中的“少年”年纪。

杨度用韵文昭告了他的家世与留学日本前的履历。

杨氏先世自明洪武年间由金陵（今南京）迁湖南，世代务农，为乡绅之家。至洪杨祸起，杨度祖父杨礼堂响应回乡练兵的曾国藩的号召，加入湘军，保家卫国，从哨长做起，官至正四品的都司，惜早早战死疆场。杨度伯父杨瑞生，十五岁即随祖父征战南北，祖父阵亡后，他荫袭了祖父的官职，后官拜总兵，先后驻守归德镇（今河南省商丘市）与朝阳镇（今辽宁省朝阳市）。总兵乃大清国正二品武官，位在提督之下，约等于今天的省军区司令，乃赫赫将军也。除伯父外，杨度还有两个伯伯，但都因病早逝，其父杨

懿生为老四。杨懿生一生全凭长兄照应，他虽有文采，但却无功名，被大哥荐往曾国荃营中做过文案，即连队文书，并用大哥的钱买了个同知銜的候补知县，等待到江苏省的哪个县去补缺（此即清朝的捐官制度）。只是，没等他挨上县太爷的实位，即因吐血而回乡，后竟一命归天。据说，此公之歿，与其长期酗酒有关。是年，杨度年方九岁，其妹李庄与弟杨钧自然更小得可怜。不过，在杨氏家谱里，杨懿生却成了令人敬仰的伟丈夫，“具文武才，居曾文正幕，有盛名。”好家伙，是文武双全的天才，而且还是同乡的曾国藩曾大人手下的干部！由此可见，当世人的盖棺论定历来就不太可信。

父亡后，杨度与妹妹杨庄即被伯父带到驻守地归德府居住，数年后回籍，一家人的生活仍由伯父照料。正是在伯父的将军府邸，他将名字改为“杨度”，“杨承瓚”自兹成为历史。

杨氏兄妹时以“才男”、“才女”享誉乡里，被本省硕儒王闿运闻知，遂将杨氏兄妹三人一并纳入其门下。

杨哲子遇上王闿运，可谓一生最重要的人际相逢。王夫子号湘绮，人称湘绮老人，海内公认的国学大师，素抱帝王之学，据说曾策动曾国藩拥兵自立以替代满清而未遂。王先生收弟子，唯才是取，无论家境。故除杨度兄妹之外，后在朝廷与民国总统府内长期作大秘书的夏寿田，甚至乡间木匠兼人像画师齐璜等，皆网罗帐下。本就自命不凡的小杨同学，遇上这样一位恃才傲物洒脱无羁的老师，想不立大志都难。于是，在恩师的悉心教诲下，他以天下为己任，苦读经、史、子、集，并深研帝王学，时刻准备着，为成为一代帝师而努力打基础。

自有帝王始，便有帝王学，依附成帝成王者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士人，古即有之。且不说战国时期奔走于各地的那些凭三寸不烂之舌纵横捭阖的“纵横家”，只说晚清，即有多少智者仆仆于此途中。竭力辅佐光绪皇帝的康有为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康有为之后，最具“帝道”精神的，即数这位杨哲子了，他很把自己当成了当代的苏秦、

杨度：市井○
有谁知国士

张仪。此后话也。

十八岁那年，杨度离湘赴京。他在诗中所说的“京甸”，即京城附近地区。翌年，他参加了顺天府乡试，中举人。两年后参加会试，落第。彼时，甲午战争失败的悲愤氛围正笼罩着各地考生的心，他与湖南应试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请拒绝与敌国日本议和。此为他参与政治活动之始。

返回湖南后，他又回到王夫子的衡山东洲书院，又是数载寒窗。其间，维新派二号人物梁启超应聘来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只已名满天下，却只比他大一岁——二十三岁。两位年龄相仿、志趣相投、政见相同的“少年”，虽学问上各从师说且每有辩论，却自此结为至交。转年（戊戌年，即1898年）梁氏被光绪帝赏六品衔，调往京城与维新领袖康有为主持变法大业，而杨度则二度赴京赶考。“戊戌变法”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而猝然失败，光绪帝被幽囚，康、梁潜往海外避难，杨度的同乡与好友谭嗣同等六位维新派京官则喋血京城的新街口刑场。

没有资料表明那一年梁、杨二人曾在京师相聚，但好友梁与谭的悲壮从政经历无疑会给志在救国的杨度以极多的启迪。

“庚子之乱”后，太后幡然悔悟，遂新政兴起。湘省一向领风气之先，巡抚每与德高望重的湘绮老人相商各事。“因此杨有良好机会获知新政新学，对于他的思想甚多新启示，更形成他经世致用舍我其谁的壮志”（吴相湘语）。随后，湖南省有志且有钱的“少年”们纷纷东渡。已经不满足于坐而论道的杨哲子，为寻“今日夷务应付之方”，不顾恩师和妹妹杨庄（时已成为王闿运的四儿媳）的反对，毅然离开故土，自费赴日本，入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班留学，成了黄兴、胡元倭等湘省“少年”才俊的同窗。此光绪二十八年春，杨氏实二十七岁。

“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池中长大的杨度，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痛痛快快地接受到了西洋文明的云雨滋

润，终于一飞冲天，成了腾游于十八世纪初中国上空的一条思想之蛟龙。

抵达日本后，他即“以‘勤学’称”，五个月后结业，曾三次与考察过清国教育的日本高等师范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辩论满汉关系、政治改革、教育方法等问题，并为日本人所著的教育专著作序，显示出极高的见识与文采。结业后，他曾返回国内，在上海向苏松太兵备道袁树勋申办《游学译编》并获成功。当时，上海为松江府辖下的一个县，苏松太兵备道即分管江苏省苏州、松江、太仓一带的最高军政首长（在日本办一本期刊，需要就近向国内地方政府预先报批，这实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重返日本后，他即在黄兴等湘籍留学生精英的支持下创办了《游学译编》，此为各省留学团体的第一本期刊，卷首，是“湘潭杨度”撰写的《叙》（今作序），他明确表示其办刊宗旨：要将被外国人蔑称为“老大之国”的中华“一变而为地球上最少年之一国”。此月刊存世一年，刊出大量思想性的编译文章和自撰的时评与白话小说。史家吴相湘评价该刊时，称“在当时严肃刻板的士大夫社会中实为空谷足音”，可见影响之大。

正是在日本，杨度开始了其长达三十年的“经济”生涯。

“经济”的本意为“经世济民”，与治理国家意思相同，与今日盛行的从日本贩来的“经济”——社会物质生产等概念——完全不是一码事。

杨度留学日本的第二年，即1903年，满清统治者已痛感人才之匮乏，而正常的科举制度又无法为各级政权提供优秀的后备干部，于是，便接受了贵州学政严修等人的提议，下诏举行“经济特科”考试——此“经济”为我中华原版的“经济”，即专为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而举行的一次全国性特别考试。经济特科的开考，绕开了既有的选拔官僚的八股科举制，三品以上的各部、院和各省督、抚、学政，必须保荐各地“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由皇帝审批后，诏令其晋

杨度：市井○
有谁知国士

京直接参加“殿试”（在紫禁城里参加考试）。

已有“经济”名声的湖南才子杨度，入闱特科考场并不出人意料，让人意外的是，他是被四川总督锡良（满人）荐举给朝廷的。清时，湖南与湖北两省的一把手是湖广总督。湖广总督或湖南巡抚、湖南学政等本土大员没有向皇上推荐这位湘籍才子，而偏偏让异地的旗籍蜀督抢了伯乐之功，足可见当时满族疆吏对国运之关切和对人才之渴求，亦可知“戏说”历史的文艺作品全不可信——那些作品总在告诉我们：皇权时代的大小官吏，个个是贪官，人人都昏庸，哪里还顾得上为国分忧与“培养人才”啊！

于是，清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五（1903年7月9日），二十八岁的杨度和全国各地推荐来的186位“拔尖人才”，在辉煌无比的紫禁城保和殿里参加了考试。考题为皇上“钦命”。好一个杨度，从容不迫地缴上了答卷，过后，楞是把八位阅卷大臣全“震”了！而其中一位“批卷老师”，就是颇有声望的湖广总督兼参预政务大臣张之洞。张大人那双老而不昏花的眼睛显然盯上了“杨度”这个名字。五年后，正是已经成为当朝第一汉臣（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张之洞与另一位重量级的汉官袁世凯（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联名奏保，在野的杨度才一跃而为中央政府里的四品京官。此后话也。

初试成绩发榜下来，杨度高居一等第二名，仅次于日后的政敌、当过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的广东人梁士诒！数日后，他和梁士诒等人又顺利参加了复试。封官加爵指日可待矣！

然而，就在朝廷准备为政坛新生代分配工作之际，养心殿里猝然传出不祥之讯——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瞿鸿禨时，意外听说：参加此次考试人员，多有“新党”混入其间！这个老瞿，真是“大义灭亲”，他正是湘乡人，为了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竟然把小老乡杨度送上了砧板！太后很郁闷，诏令缩小录取范围，只收前三十名。紧接着，又有两江总督魏光涛两次电奏朝廷，点名道姓地举报杨度等考生曾

与上海革命党“通同一气”！老太后正为录取的头一名的名字而生气呢——有多事的官员上奏说，“梁士诒”这名字竟是“梁头康尾”，即老佛爷最痛恨的梁启超的姓、康有为的名（康氏原名康祖诒）。老太后勃然大怒，立即传谕：将梁、杨查办！一夜之间，“新科状元”和“榜眼”沦为通缉犯，杨度只好潜逃出京，转道上海再渡东瀛。仓皇亡命的杨度，哪里会想到，是次远航，不过是自己一生中不断去国外或租界作政治避难的“处女航”。

再到日本的杨度，却因祸得福，因清廷先欲重用后又缉捕而名声大噪，那首长达246句的《湖南少年歌》，就是那时写成并刊发于梁启超的《新民丛刊》上的。早在日本流亡的梁启超，曾以长文《少年中国说》打动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心，杨氏的《湖南少年歌》，算是对梁之呼唤的应答。杨氏以韵句详说湖南人文地理，历数本土先贤名流，讴歌湘军血性精神，警醒同乡奋起救亡。尤其是那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一句，更是沸腾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少湘籍热血青年的心！与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发起成立湖南新民学会的萧子昇，晚年在乌拉圭回忆过，当年，毛“曾对杨度和他的政治行动感到极为兴奋和热切”。

《湖南少年歌》虽为杨氏的经典之作，但却不易流传，倒是他创作

的一首歌词，传回国内，乘着歌声的翅膀，让其“杨哲子”大名四处飞扬：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
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
古来圣贤，生此河干；
独立堤上，心思旷然。
长城外，河套边，
黄沙白草无人烟。
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

杨度：市井
有谁知国士

○ 历史小说《杨度》



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

君作饶吹，观我凯旋。

本来，中国式的课堂教育，只有摇头晃脑的吟诵而没有委婉悦耳的歌唱，“音乐”登不上大雅之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第一次在《钦定学堂章程》里明确规定，今后各学堂课程中须设“乐歌”，即音乐课。翌年，清廷又为此事颁诏督促。于是，第一代中国的音乐教材便应运而生。此为杨度主动撰写《黄河》歌词的小背景。

大背景则是沙皇俄国正于我外西北边陲上蹿下跳，鼓动外蒙独立。祖国的边关之危让以天下为己任的杨度不肯缄默，遂在异邦创作了这首讴歌华夏儿女母亲河的歌词，以寄托对祖国命运的忧思与祝福。此歌词也是在梁启超的《新民丛刊》上发表的，传回国内，多位音乐家为之谱曲，尤以沈心工氏所谱的最为壮美。慷慨悲壮的歌词，加上深沉大气的曲调，使《黄河》成为清末各学堂必唱的一首回肠荡气的爱国歌曲。茅盾晚年就曾说，他那一代人都记得少时唱过的《黄河》的词曲。令人扼腕的是，此歌从清朝唱到民国，传唱了16年之后，1921年，词作者期盼“饮酒乌梁海”的我唐努乌梁海地区，终被已经号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维埃俄国策动独立了，成了附属于苏俄的“乌梁海共和国”，即现今的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

好在，又过了七十多年，上世纪末，中国音乐界评选“二十世纪经典歌曲”，杨度与沈心工合作的《黄河》赫然入选。此歌虽不若李叔同从美国人那儿挪来曲调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影响更广，但意义却更加深远，被评委们列为排名第一的经典之作。迟来之首肯，堪慰词曲作者的在天之灵乎？

当年的杨度，能写一流的歌词，更有一流的政见。

在留学日本的中国“少年”们那儿，自“泰西”传来的这主义那主义的，风生水起，人心披靡。但特立独行的杨度，经对东西各国的人文、政治、经济乃至国民性等深刻研判之后，毅然独创了自己的主义，

即“金铁主义”，他认定，只有金铁主义才能救中国：

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

在1907年1月他创刊的《中国新报》上，他将自己的金铁主义解释如下：

对内的——富民——工商立国——扩张民权——有自由人民——政党。

对外的——强国——军事立国——巩固国权——有责任政府——国会。

说得够明白了吧？别忘了，那会儿还是大清光绪三十三年，是大臣们只会说“皇上（或皇太后）圣明，臣（或奴才）罪该万死”的君权时代。老大帝国，历来君主一个人说了算，哪有什么“政党”、“责任政府”和“国会”的概念？更遑论“民权”（即现在说的人权）！早在那时，不及而立之年的杨度即对国家未来体制有了如此清醒的架构，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等满清统治者终于被迫组成责任内阁时，却已是1911年5月，距龙旗坠地只剩下半年时间了，晚矣！

悠悠百年，杨氏的主义早被人们忘到了爪哇国。于今，国与民的进退关系、扩大民主与限制公权力的讨论声又日趋热烈。翻检出杨氏理论来重温一番，竟会发现，所谓的敏感话题，其实早在一个世纪前就被杨度说清楚了。读其旧作，竟每每被其思想的光芒刺得眼痛！

比如他说：

民权不昌之国，其政府必为专制之政府。夫专制政府之行为，决未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之意，即或口为保护之言，亦不过虚伪以欺人，不旋踵而自相违反矣。

再比如他说：

……政府非以人民意思所组织而成者，故对于人民不负责任，而无以国事为己事之心也。……故今日之政府，对于内而为偷钱之政府，于外而

杨度：市井○
有谁知国士

为送礼之政府。以国权寄托于此等政府，其所余者有几何矣？

即使论及两年前在中国领土上结束的日俄战争，他也没人云亦云地把战争的胜负归结于两国战略与军备的对比上，而是将结论下在两国的政治体制的优劣上（时俄为专制国体，日本为君主立宪制），最终，板子却落在吾国落后的“专制政体”上：

如今世界，论最野蛮之国当首推俄。俄宜居于优胜矣，然而与日本之军队遇，遂将数十百年来执牛耳于欧亚两洲之雄威，一败涂地而不可复振，则纯粹之野蛮国其不足以居优胜也必矣。何也？彼之国内组织至不文明，宗教上、政治上、种族上阶级至多，人无平等自由之乐。其治内力既如此之弱，其对外力之决不能强者，此自然之理也。

世界各国之内治上，其尚为专制政体者，惟俄与中国也。俄既如此，宁可复肖之欤？

所有的症结都归诸体制，真是超人一等，入木三分！

甚至对本国何以屡遭列强欺凌，他也大有“反潮流”的卓然见解：

由家族而成部落，由部落而成国家，至成国家而政府立焉。政府者，所以为国民谋公益者也，所以拒他民族之妨我民族之权利者也；故各国之政府，无不以国民利益之所在，而为举动之方针。

……夫各国政府，孰不思夺他国国民之利以自利其国民？我国民若以此而怒人，不如其求自立也！

在国运式微、朝野一片哭天抢地的抱怨声中，他的声音颇有些刺耳，但平心而论，却极有道理。

知否？杨度还是最早提出“中华民族”的人。就在其《金铁主义说》中，他写道：

“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族名……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舍定义于